

胡政之誕辰120周年

胡政之簡歷

- 1889年 出生於四川成都
- 1907年 赴日留學
- 1912年 任上海《大共和日報》及民主圖書公司的日文翻譯。同時自組衡平律師團，執行律師業務。不久出任江蘇高等法院刑庭庭長。
- 1913年 任《大共和日報》總編輯
- 1916年 任《大公報》經理兼總編輯
- 1919年 前往歐洲採訪巴黎和會
- 1920年 任北京《新社會報》總編輯
- 1921年 於上海創辦國聞通訊社
- 1924年 創辦《國聞週報》
- 1926年 接管《大公報》，任經理兼副總編輯
- 1937年 抗戰爆發前後，主持《大公報》上海版、香港版、桂林版的出版編輯工作
- 1941年 到重慶管理《大公報》事宜
- 1945年 4月，胡政之以無黨派人士的身份，作為中國代表團的成員，赴美國三藩市參加聯合國成立大會
- 1948年 去香港，恢復《大公報》香港版，又在美國出版英文《大公報紐約雙周》
- 1949年 4月病逝於上海

胡政之 新聞巨擘 經營奇才

具有百年歷史的大公報人才輩出，其中由擅長集資的吳鼎昌、文風犀利的張季鸞、善於經營的胡政之組成的「最佳拍檔」尤為人們津津樂道。而三人中，胡政之主持《大公報》的時間最長，先後27年。這也是大公報最輝煌的時期，由1926年復辦時的幾千份，增加到1949年的20萬份；資產亦由5萬元增至6億元；從一份華北地區的報紙發展成全國性的知名大報。這一切雖與大公報全體同仁的努力分不開，但無疑以總經理胡政之所作的貢獻最多。今年適逢胡政之誕辰120周年，本報特作專刊，追憶這位為《大公報》及中國的新聞事業鞠躬盡瘁的報壇巨擘。

本報記者 朱穗怡

中國新聞史學會會長方漢奇教授曾經說過，「胡政之是中國新聞事業史上不會也不應該被忘記的人物」。這是因為胡政之本身就是一部中國近代新聞史。他24歲就當上了章太炎主辦的上海《大共和日報》總編輯，31歲擔任著名報人林白水主辦的《新社會報》主編，隨後又成功創辦了著名的《國聞週報》、國聞通訊社，37歲接辦了20世紀中國報壇上有重大影響的《大公報》。胡政之在舊中國的新聞界掙扎了近四十年，被同時代的人尊為「報業祭酒，論壇權威」。

胡政之的新聞生涯大部分都是在《大公報》度過的。他首次與《大公報》結緣是在1916年至1919年期間被《大公報》聘為經理兼總編輯，但於1920年辭職。隨後在1926年，吳鼎昌、張季鸞、胡政之這三個曾留學日本的老同學在天津日本租界重聚，當他們得知《大公報》因經營不善而停刊數月時，很快就萌發了接辦的想法。於是吳鼎昌出資5萬元，拿出其中1萬從王邵隆的兒子王景祥手中購買了舊大公報館，以胡政之為國聞通訊社和國聞週報的幹事及原《大公報》員工為基礎，新記《大公報》於1926年9月1日又繼續發行了。

當時的分工是：胡政之任總經理兼副總編輯，主管報紙營運；張季鸞為總編輯，負責撰寫社評；吳自任社長，為報社籌集資金。因此長期以來，不少人都把焦點放在胡政之的管理之道上，而忽視了他其他方面的才華。其實，胡政之從採訪、翻譯、編輯，到寫評論，無一不能，無一不精，既能運籌帷幄，決勝千里之外，又能在關鍵時刻披堅執銳，奮戰在採編第一線。「七七事變」爆發後，張季鸞應蔣介石之邀上廬山共議國是，胡政之挺身接掌筆政，每天發表一篇社評鼓勵「全民抗戰」，並提請國民政府對內「明恥救戰」動員民眾。胡公這一時期的社評奠定了大公報八年抗戰期間「文章報國」的政治基調。誠如名報人徐錦成所說：「邵飄萍、黃遠生諸先生富有採訪經驗，文章恣肆，而不長於經營。史量才、張竹平、汪漢溪諸先生工於籌計，擊畫精緻，而不以著述見長。

恐怕只有胡政之可稱多面手。後起的如成舍我輩，雖也精力充沛，編輯、經營都有一套，但手面、魄力似乎都不能與胡相比」。

勇於創新 採編皆能

胡政之早年活躍在新聞前線，是一名有多項創舉的資深記者。首先表現在他對國際新聞敏銳的觸覺上。最廣為人頌的是他參加了1919年召開的巴黎和會，是採訪這次會議唯一一名中國記者。當時的北洋軍閥政府因怕引起國內民憤，全力封鎖「巴黎和會」的消息。正是胡政之的「巴黎專電」揭露了日本勾結英法兩國強奪我山東青島主權的卑劣行徑，更成為觸發震驚中外的「五四運動」的導火線。胡政之因而被稱為「採訪國際新聞的先驅」。後來在抗日戰爭期間，他曾作為中國訪英團代表之一，前往英國從事民間外交，抗戰勝利後，他成為出席三藩市聯合國大會的中國代表之一。期間，他發表在《大公報》上的通訊《十萬里天外歸來——訪英遊美心影錄》、《紐約歸鴻》、《美國歸來》等有分量的文章，使中國人開拓了國際視野。

在那個年代，報紙普遍只是重視軍事、政治新聞以及花邊社會新聞，較少做一些名人訪談的專題及教育、經濟方面的新聞。大膽創新的胡政之則於1917年元月在《大公報》開創了「特別記載」的欄目，每期親自採訪一位名流，配發照片，談論的話題從政治、外交、財政到社會、文化、教育、思想，無所不包，採訪對象不限於中國人，也有外國在華名流。這在當時無疑是個創舉，在中國報業史上也有示範意義。胡政之還推出「實業專紀」，介紹商界的經營之道；推出「教育專紀」，刊登教育類的消息；刊登「今日銀元行情」及「各地股市」，報道經濟信息。這一系列的改革大大豐富了報紙的版面和內容。

評論時事 鏗鏘有力

社評是一份報紙的靈魂，代表了報社的立場和觀點。不少人以為那個時期《大公報》的社評皆出自張季鸞之手，其實早在1917年11月胡政之就以「冷觀」為筆

名在《大公報》發表第一篇社評《財政與外交》，隨後他幾乎對當時國內、國際的許多重大事件都發表了自己的看法。例如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際，他就敏銳地察覺到日本對中國的威脅，向國人發現「彼日本已布置地盤」、「此等危機已有萌芽，望我國民監視勿懈也」的警告。又如，一戰結束後，他在《世界之新紀元》一文中指出「中國不能自外於世界之外，應打破鎖國的舊思想，了解新時代的新思潮」，「酷烈的大戰雖已停止，而文化競爭、經濟競爭的激烈，絕不在戰爭之下，中國應急圖自全之道」。這些言論不僅在當時是真知灼見，在當今也頗有啟發意義。

胡政之寫文章還有一個特點就是才思敏捷。據曾任《大公報》總編輯的李俠文回憶，「政之的文思極迅速，有時他無暇執筆，請同人替他筆錄，他說一句寫一句，竟能段落分明，斐然成章，事後不必改易一字」。李俠文評價胡政之的文章「是以氣魄勝」，「總是切合實際，綜核名實，言簡意賅，與季鸞先生那種明暢精簡的文風，各擅勝場，互相輝映，蔚成早期《大公報》社評特有的風格」。

經營有道 獨具風格

胡政之的才能是多方面的，不僅是一位優秀的新聞工作者，也是一位傑出的經營家。《大公報》舊人陳紀濤也說：「文人辦報往往處於於利，但是，不考慮從印刷到發行，從廣告到旅費，從經營到銷路，往往就會斷送報紙的前途。以經營為本，以辦好報紙為目的，在經營管理上如此用心，並且創造了一系列獨具風格的辦報經驗，在中國近代新聞史上，恐怕就只有胡政之一人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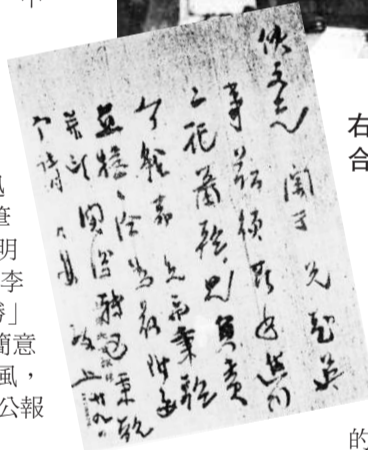
對於報紙的營運，胡政之確有自己的一套辦法，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特點：

- 一、權責分明。胡政之把報館內部分成編輯、經理兩個部門，編輯部擁有言論權，經理部擁有財權，兩方面互相督促，互相制約。他還拔除經理部的幹部，往往是在編輯部工作過的，知道編輯部的需求，這樣經理部才能因應編輯部開展業務，運轉起來不致彼此脫節。
- 二、高薪留人。復刊頭兩年報館還在虧本時期，他和張季鸞名義上只領100元月薪，而幾個重要編輯的月薪都在150元至200元上下，駐外的特派記者，則高達300元，外加辦公津貼。後來，還增發年資薪，進館滿5年的，可加發月薪5%，10年的增加10%，如此累進。因此，儘管其他報館經常向《大公報》「挖牆腳」，但《大公報》人極少他就。
- 三、培養人才。胡政之發掘人才的途徑很多，既有招考，也有推薦，還有從同業中挑選，甚至在投稿人和通訊員中物色。1935年當《大公報》需要物色一位能編輯「小公園」，又能兼管各種副刊業務



▲圖為胡政之（前右一）一九四八年與費彝民（前右二）、馬廷棟（前左一）、李俠文（二排左一）等，合攝於香港淺水灣（資料圖片）

胡政之遺墨



的人時，他找到了只有22歲的蕭乾。但蕭乾擔心自己年輕，難當重任。胡政之便說：「我就是覺得這副刊編得太老氣橫秋了，現在就是要你按自己的理想去改造它。」蕭乾就是從編輯「小公園」入手，得到了培養和鍛煉。除此，《大公報》還培養了一大批高素質的中堅分子，如徐鑄成、張琴南、金誠夫、王文彬、曹谷冰、孔昭愷、范長江、孟秋江等等。

四、用人兼容。

《大公報》文人聚集，性格各異，但人事糾紛卻較少，這主要與胡政之「用人兼容」的風格有關。他容許每個人保持自己的個性，可以各盡其才，沒有多少限制。這種寬鬆自由的工作環境，有利於員工的創作。

在張季鸞、胡政之的帶領及《大公報》全體員工的努力下，《大公報》在中外

享有盛譽。1941年5月15日，美國密蘇里大學新聞學院授予《大公報》1941年度最佳外國報章的榮譽獎章，這是第一張中國報紙在國際上贏得如此殊榮。

操勞過度 上海逝世

由於胡政之在編輯部和經理部都擔任要職，其工作相當繁重。據報社的同事說，他每日上午處理發行、廣告等經理事務；下午參加編輯會議，評比各報內容，尋找新聞線索，指令記者採訪；晚上和吳鼎昌、張季鸞商量社務，研究時事，選擇社評題材，每星期撰寫幾篇社評，每天工作十一、二個小時是常事。尤其是1948年3月《大公報》香港版復刊，可謂百廢待興，工作艱巨。胡政之每天工作的時間更長達十四個小時。由於長期操勞過度，他於同年4月伏案工作時，突然病發，立即返回上海，後診斷為肝臟硬化，醫治經年，於1949年4月14日溘然長逝，終年60歲。

雖然胡政之早已離我們而去，但現今的《大公報》依然保持着胡政之、張季鸞等前輩留下的優良傳統。《大公報》當再接再厲，創出佳績，以告慰先人。

少年求學嗜書如命 中西文化融會貫通

胡政之的辦報經歷蜚聲於時，但其青少年時代的求學故事卻鮮為人知。胡政之於1889年出生於四川成都的一個舊官僚家庭，父親是個舉人，捐官安慶知縣。幼時的胡政之聰慧過人，從粗曉文字的母親讀三字經、千字文。七、八歲時，隨父親離開開塞的四川，來到安慶讀私塾，後考入安徽省高等學堂，開始接受新的教育。

接受西方新思潮

安徽高等學堂是十九世紀末在敬敷書院基礎上創辦的一座新式學堂，胡政之在這裡有機會接觸到了中西方各種社會新思潮，以及先進的自然科學觀。他如飢似渴地飽覽了大量的新思潮的書籍、報刊，尤其愛讀嚴復翻譯的《天演論》。該書以「物競天擇」、「適者生存」的生物進化理論闡發其救亡圖存的觀點。胡政之反覆讀了《天演論》後，深受啟發，接受了進化論的觀點。他也迷戀過《申報》、《新民叢報》、《蘇報》及陳獨秀創辦的《安徽俗話報》等，這些報紙所

傳播的信息都對胡政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，開始接觸了改良、民主思潮，並在腦中烙下了深刻的印痕。

研讀桐城派古文

此外，安慶是桐城派的誕生之地。明清兩代，桐城文風一統全國，有「天下文章看桐城」之說。桐城派，有1200餘位作家、2000多種著作、數以億字的資料等，是桐城散文派在200餘年間創造出來的文明成果。因此，胡政之在接受新思想的同時，對桐城派的文章及其研究下過一定工夫，奠定了良好的古文基礎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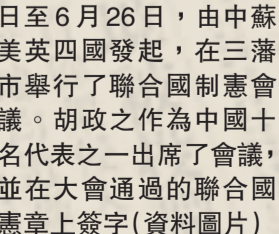
1906年，胡政之父親因病死於五河縣知縣任上時，17歲的胡政之不得中途輟學，離開安慶而扶柩回四川。1907年，他的嫂子變賣金鑄，資助他到日本勤工儉學，進東京帝國大學讀法律。

四年後他回到上海，一度開過律師事務所，1916年9月，他受聘出任《大公報》的經理兼總編輯，從此一生以辦報為業，並成為「報界巨子」。

▶ 1950年4月14日，胡政之逝世周年，上海《大公報》館同人致祭（資料圖片）



▶ 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，由中蘇美英四國發起，在三藩市舉行了聯合國制憲會議。胡政之作為中國十名代表之一出席了會議，並在大會通過的聯合國憲章上簽字（資料圖片）



▶ 1947年胡政之（右）在北平與家人合影（資料圖片）

